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概况

1988年我国报纸事业发展概况

1988年全国的报纸工作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特点:

(一)根据我国宪法,制定一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新闻法提上了日程。1988年制定新闻法的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新闻法的制定工作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牵头负责。1988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起草小组成立,并于1月13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新闻法起草小组由新闻出版署、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全国记者协会、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等单位的代表组成,到1988年底,新闻法起草小组办公室已拟定初稿,提供讨论。在起草新闻法的过程中,有关人员多次探讨新闻自由、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新闻业的职能和体制以及记者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二)新闻改革稳步开展。党的十三大以来,新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新闻改革的实践也不断展开。根据各主要新闻单位领导同志的讨论,明确了1988年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的新闻改革着重做好四件事:(1)提高新闻开放程度、增加信息量;(2)组织好社会协商对话的报道;(3)正确开展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4)提高宣传水平,增强宣传效果。

1988年新闻改革的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务政务活动增加了透明度,凡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会议,都及时报道,并公布会议的主要内容;二是对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的报道比较准确、及时,如1988年1月7日的270次列车火灾事故、1月17日黑龙江客货车相撞事故、1月18日重庆空难事故、1月24日80次列车颠覆事故、3月24日上海市郊火车相撞事故等,都在事发的次日或第三天就公开报道。三是批评报道

明显增加并得到许多领导部门的支持。各报的报道主要集中批评不正之风,尤其是对“官倒”、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重大案件,许多报纸都给予揭露和抨击。黑龙江、陕西、广州等省市的领导干部公开表态欢迎报纸的舆论监督。广东省纪委还专门致函《南方日报》,支持该报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有的企业还给报纸设立“舆论监督奖”、“批评风险基金”等。

随着批评报道的增加,新闻纠纷、新闻诉讼也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诉讼案件就有300多起,北京约有20起,上海约有40起之多,而且在新闻诉讼中,报社胜诉的很少,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严格控制创办新报纸,努力调整报纸的结构。1987年全国正式登记公开发行的报纸是1491家;1988年新闻出版署批准50家新创办的报纸,并批准35家报纸由内部发行转为正式公开发行,总共增加了88种。这样,到1988年底为止,全国正式公开发行的报纸共1579种。1988年批准创办的报纸中,地(市)、县(市)级党委机关报14种、部委机关报12种、经济类报纸15种、文体教育类报纸6种、其他类报纸43种。从以上发展的结构看,比较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

(四)报社的内部管理体制有新的变化,许多报社加强了报社经营管理的领导。198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此后新闻出版署征得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意,就这个《暂行办法》作了几点说明。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报社可以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服务和经营活动。文件还规定了报社开展多种经营的范围及有关政策,其中第三条规定报社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结合本身业务和社会的需要举办经济实体(如造纸厂、印刷厂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后,依法从事经营活动。”这就给报社的经营活动放宽了政策,使报社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报社过去办的企业也合法化了。文件还指出报社

的经营活动应由经营部门负责,其所办的公司、企业,均不得从事与本身业务无关的纯商业经营。《暂行办法》公布之后,全国许多报社纷纷举办多种经营项目,有的办企业、公司,有的搞服务、交流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北京各中央级及国家各部委所属报纸办的公司、企业就有80多家。各地报社也纷纷搞起多种经营。这对增加报社经济活力,促进报社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

(五)1988年报纸的发行体制改革有新的发展。在以邮发为主渠道的同时,报纸的多渠道发行工作进展很快,自办发行的城市报纸由1987年的16家,增加到30家。1988年里就有14家城市报纸自办发行。省级报纸《天津日报》自办发行,在全国报界反响强烈。

自办发行的报纸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投递时间早,发行数量增加,节省了发行费用。实践证明:报纸自办发行是报纸发行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报纸的自办发行工作将会更加完善,更加合理。

(六)1988年全国报界纷纷成立群众团体,这对加强报纸行业的联系、交流,对报界的自我管理将起着重要作用。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报业团体有:中华全国报纸行业经营管理协会、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中华全国企业报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全国商报联合会、全国文摘报联谊会等。

1988年也是我国报纸行业经济上非常困难的一年,新闻纸价飞涨,报纸价格又很低,许多报社严重缺乏纸张和资金,但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报社自己的努力下,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日子比较好过”的1989年。

(林凤生)

1988年我国新闻通讯事业发展概况

1988年,新华社围绕强化国家

通讯社的职能、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坚持“把握大局,改进作风,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坚持新闻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在新闻业务、国外事业和通信技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新闻业务方面:

国内报道工作重点抓了三个服务,即:改变作风,为分社和采访第一线服务;调查研究,办好内参系列刊物,为各级领导干部服务;压缩通稿字数,提高通稿质量,实行稿件分流,为各家报台和广大读者服务。

体现在:(1)宣传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把改革、开放、稳定作为报道的基调,积极宣传了中国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以及新人、新事、新风尚,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评了工作中的问题。1988年国内部日均发通稿49条,约26,000字,比1987年46.6条略有增加。在所发通稿中,有相当数量的稿件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实际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反映改革十年成就的稿件《改革十春秋,华夏展新姿》、《千万个巨人站起来》、《改革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十年改革启示录》等,起到了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推动改革的作用。1988年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年,也是改革遇到难关的一年。如何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报道把改革引向深入,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在这方面,新华社发了不少有相当深度的报道。如关于物价的《关于物价问题的通信》、《从物价看国情》;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一支在职的失业大军》等一组4篇;关于治理整顿的《全国是个大工地》、《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等系列报道;关于住房改革的《花了三百亿,买了个不满意》;关于教育改革的《中小学教育广角镜》;批评稿件《夏斐之死》、《西安出了一起查垮企业的检查组事件》、《“倒爷”闯关记》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加强调查研究工作。1988年国内部先后组织了两次调查研究战役,一次是以深化改革为内容,组织

了9个小分队;一次是以治理整顿为内容,组织了5个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分社与分社协作区之间还开展调研。1988年仅内部刊物登载的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就有近50篇。这些调查报告对中央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关于粮食问题的调查,写出了一组4篇调查报告:危机篇、症结篇、启示篇、对策篇,阐明了当前我国农村以粮食生产为焦点的经济形势和改革的出路,引起了中央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3)扩大报道面,更好地为报台服务。1988年国内部在抓住形势、改革报道的同时,还编发了一批反映社会各方面生活的稿件,内容涉及物价、旱情、汛情、高温、法制、社会风气、医疗卫生、文物考古、人口增长、婚姻家庭、奇异自然现象等,多为专稿、特稿。从9月12日起,还开辟了广播电视专线新闻,每天发稿120—150条。这些改革,都受到了报台和读者的欢迎。

对外报道用英、法、西、阿、俄、中六种文字广播,1988年月均发稿5000条,比1987年增加30%。英文广播日均发稿46条,比1987年增加29%;法文广播日均27条,比1987年增加63%;阿文广播日均24.3条,比1987年增加25%;俄文广播日均17.7条,比1987年增加44%;中文广播日均32.8条,比1987年增加25%;西文广播日均23条,保持1987年水平。各语文广播都在逐步向采编译结合的方向发展,并加强了专稿,适应地区特点,受到了用户的欢迎。对外播发的中国新闻在香港落地月均1300—1700条次,利马500—600条次,内罗毕350—550条次,纽约250—350条次,马尼拉150—350条次,墨西哥100—150条次,曼谷100—140条次,加德满都100条次。西方四大通讯社月均播发中国新闻500条,其中采用新华社新闻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高于往年水平(20%)。塔斯社及下半年以来月均播发中国新闻160条,比上半年增加一倍。对外中文广播有14条专

线,60多家订户。港澳地区订户30家(去年22家),1—9月港澳报纸采用新华社对外新闻6577条次,占我发稿总数77%以上,专稿采用率85%以上。中国特稿社除稳定地向亚、非、拉国家供稿外,还积极向美国、西欧、日本、加拿大开拓,目前用户已有130多家。

国际报道英文通稿日均发稿141.4条,法文专线日均102.5条,西文专线日均111.4条,俄文专线日均17.9条,阿文专线日均36.1条,中文通稿日均47条,采用情况良好。

摄影报道,1988年共发各类新闻图片32727底(其中,国内4346底,对外9400底,新闻中心5200底,国际10292底,展览1686底,胶版803底)。七届人大、政协一次会议和24届奥运会的报道,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取得了良好成绩,国内通稿采用率达80%。国内图片报道还重点经营思想内容有深度、表现手法有新意的专稿,调整稿件构成,增加信息量,受到报纸和读者的欢迎。对国外推出选题80组专题照片,80%以上选题为巴黎、伦敦、纽约的图片商社采用。国外报刊对新华社图片的采用率比去年有较大增长。

(二)国外事业方面:

1988年共发展电传稿新订户57家。其中,拉美地区继续领先,发展订户30家;亚太地区11家;非洲地区8家;西欧和北美地区各3家;中东地区2家。这样,新华社电传新闻在国外的直接订户达到285家。这一年,还新开辟了对雅温得、堪培拉、阿尔及尔、马德里等用户的供稿业务,使开展电传供稿业务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50个。

各地区用户采用新华社新闻的数量不断增加,第一季度日均800条次,第二季度以后日均1000条次以上。拉美地区用户每月采用在1万条次以上,居首位,占总采用率的45%。月采用量在1000条次左右的国家(首都)和地区有:雅温得、墨西哥、利马、巴拿马、香港、基多、圣约瑟、加拉加斯、哈拉雷、拉各斯、澳门等。新华社新闻已成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新闻机构的主要消息来源。东

京、雅典、巴黎、伦敦等发达国家首都的新闻用户采用我社新闻也有所增加,扩大了新华社的影响。

1988年3月,新华社还开辟了对加纳、多哥、利比里亚、刚果、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等国的无线英、法文广播,这些国家的通讯社使用新华社提供的设备抄收我社新闻,供当地报刊采用,取得了一定的宣传效益。图片供稿业务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三)通信技术建设方面:

1988年新华社建立了国内新闻卫星直播网。它采用美国康特尔公司的C-144A型地球站,属于单向只收式小型数据接收站。到12月底,新华社已为国内19家地、市报社安装了这种小型卫星数据地面站,可以联接如中文微机、文传机、图传机、电传机等四种业务的接收终端设备,能同时抄收四种不同的信息,抄收速度每秒可达40个汉字,比模写方式快20倍。国内新闻卫星直播网的开通,从技术上为边远和通信条件差的地市报纸接收新华社新闻开辟了一条新路,保证了时效和质量。

国内中文微机通信网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对近20家地市报台的通信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现在,新华社中文微机通信网络联系的报台达到91家。

同时,又加强了对国际通信网络的技术改造。1988年新华社国际专用线路达到51条;10月,新华社北京—香港卫星专用电路由原来频分制式改为时分制高速数据电路,并用于工作。11月,新华社对港澳地区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中文新闻供稿实现了电脑自动转送。8月,新华社从法国引进三套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小型新闻图片计算机处理系统,分别安装在总社图片传真机房和香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的机房里。这个系统具有图片收发、编辑、贮存、检索、通信等功能,并与总社EPD大图片处理系统联网,提高了新闻图片的质量和时效。

从1988年9月12日起,新华社建在北京火车站东侧的大屏幕新闻快讯发布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它是国

内建立的第一套高亮度大屏幕新闻快讯发布系统。显示面积为41.6平方米,每天播放12小时,主要内容包括:(1)新闻快讯;(2)世界各大城市和国内39个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3)转播中央台和北京台的电视新闻;(4)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的标语口号;(5)综合经济信息;(6)文体节目;(7)外汇牌价;(8)广告。它的建成,不仅为途经北京火车站的群众提供了一个获得新闻的途径,扩大了新华社的宣传渠道,同时为首都的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光彩。

(四)开拓信息服务方面:

1988年7月,新华社成立了经济信息编辑部。这标志着新华社的功能和业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长期为报纸、电台、电视台供稿扩大到面向社会,为企业服务的新阶段。其目的是为适应我国开放改革的形势需要,促进四化建设。

几个月来,信息部在社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总社兄弟部门和国内、外分社的大力支持,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1. 改进内容,扩大发行《经济信息》。

《经济信息》创刊于1985年1月,每周三期,为国内订户——政府经济决策部门和大中小公司提供国内、国际工、农、经贸、金融、市场行情信息。四年来,它在传播信息,促进流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编辑部人力有限,下面又无专职信息人员,所以稿源不广,信息不灵,限制了这本刊物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信息部成立后,总社调整了人力,各分社配备专职信息人员,同时,还动员社会力量,建立信息通讯员网络。在短时期内,来稿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同7月会前相比,仅国外分社来稿就增加3倍。

9月5日,编辑部将原来的《经济信息》改版,突出来自中央和地方领导机构的信息和国外信息。在不削弱微观信息的基础上,适当加强了宏观信息的份量。改版后,取名《新华社经济信息》,以同其他信息刊物区别开来。

这种作法深受用户欢迎。9月5

日改版第1期登出组稿,报道中苏边境贸易发展前景。北京市一商局负责人看到后说,“这样的消息太及时,太重要了,对我们的业务大有作用!”并表示将安排人力,前往黑龙江、内蒙古探讨同苏联直接做生意的可能性。

青海棉纺厂一下订了10份《新华社经济信息》。厂长朱布声说:“《新华社经济信息》对开拓生产经营思路和帮助决策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质量有了改进,刊物信誉有所提高。在1989年征订工作中全国报刊发行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新华社经济信息》的订户却呈上升势头。据初步统计,订户可破20,000大关,结束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2. 设专项信息,让用户吃“小灶”

7月总社会议后,国内各地迅速向当地领导、企业宣传新华社发展信息事业的决策和优势,得到积极的响应。许多沿海地区的厂商、外贸公司纷纷要求给他们拉专线、吃“小灶”,提供行业信息。

为了帮助分社满足这些用户的需要,信息部于11月成立了专项信息编辑室,按照用户要求,为他们开发、收集、编写国内、外信息。目前,已给11个分社供稿,日发稿量近10,000字。有些信息,由驻外分社记者特约发回,针对性强,倍受用户欢迎。这类消息包括市场行情,如东京的丝绸、蚕茧,伦敦的钢铁、粮食,澳大利亚的羊毛,新加坡的橡胶等。

3. 推销《中国经济信息》,初见成效

《中国经济信息》于1987年11月2日正式开播,通过电脑每周五天用英文向国外用户传递中国经济信息,内容包括中国经济政策、形势、投资法规、环境以及经贸合作机会等等。1988年7月以前,已有西德综合经济新闻社和香港大东电报局在西欧和香港地区代理发行《中国经济信息》。

信息部成立后,一面拓稿源、抓质量,一面狠抓发行。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谈判,有几个合作协议,不久可望签署。

在积极寻求国外合作伙伴的同

时,编辑部为满足外国驻京使馆、银行、商社的要求,从1989年1月1日开始,将电脑传输的经济信息打印成册,当日送到北京外国订户手中。已有订户20家,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

4. 穿针引线海内外,围绕信息搞咨询

新华社信息部成立后,不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委以咨询工作。本着为用户服务的思想,信息部咨询小组几个月来承办了一些项目,在国内、外分社的密切合作下,按时、按质地完成了任务,在顾客中赢得了信誉。

9月,河北第二机械厂慕名而来,所求咨询的项目是:该厂拟从美国引进一套价值300万美元的污水处理设备,中间人是一家港商,想了解这套设备是否先进以及这两家公司的情况。咨询小组接受委托后,在华盛顿和香港分社的配合下,很快了解到这套设备技术系60年代水平,那家美国公司在美国也没查到,香港中间人是一家组建不久的新公司。该厂得知这个调查结果后,副总工程师等来社,一再表示感谢,说,“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会背上个大包袱。”

此外,还受四川五粮液酒厂委托,帮助调查参加1989年布鲁塞尔食品博览会的可行性;受埃及一公司委托,同我电子工业部洽谈从中国引进录音机生产线等业务,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信息部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新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相信,新华社的信息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卫元理 夏兆龙)

1988年我国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概况

1988年,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厅、局、台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党的十三大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广播电视宣传紧紧围绕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个中心,全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形势教育,促

进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创造一个较好的宣传舆论环境,取得了新成绩。

(一)各级广播电视厅、局、广播电台(站)、电视台始终围绕深化改革这个主题,把宣传党的十三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形势教育,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宁夏先后播出了“十三大报告问答”、“政治体制改革讲座”和关于生产力标准讨论等,用丰富、生动的事实进行入情入理的宣传。宁夏电视台与宁夏区党委宣传部、讲师团共同组织了4次“学习十三大文件电视专题讨论会”,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为了“使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让人民讨论”,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认真组织社会协商对话的报道。山西电视台报道了省和太原市领导与社会各界的6场专题协商对话,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维庆同志与6个厂矿、企业部分职工的对话。使领导干部和群众相互增加了理解,提高了党务政务的透明度。四川省金堂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高板区100多名乡、村干部和农民代表的对话录音,反映很好。许多地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相继开办专栏节目,如天津台的《社会对话》、广东台的《公仆与公民》、四川台的《省长与农民》、宁夏台的《对话与交流》、太原电视台的《市长与市民》、辽宁省阜新台的《空中对话》、安徽省宿州电视台的《市长与市民》、四川省金堂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话园地》等,这些节目都比较受听众、观众欢迎。

(三)积极开展生动活泼、入情入理的形势教育。湖北省宜昌台开办了《说说这八年》、《说说咱们的改革》两个专栏节目,并且安排在《宜昌新闻》中播出,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据宜昌市西陵区的抽样调查,对这两个栏目有65%以上的家庭坚持收听。山西台的《改革瞭望》、山西电视台的《改革巡礼》栏目,贵州电视台的系列报道“话改革”,湖北省枝江县台举办的“改革十年话今昔”有奖征文竞赛专题节目,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展形势教育。

(四)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支持它们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批评和揭露”。事实说明,广播电视开展新闻批评,加强舆论监督,是有可为的,也是有成效的。贵州电视台记者韦世林9月10日拍摄的电视新闻“乱开发票成为干扰物价改革的一大社会公害”,选择了贵阳华丰电子商场、贵阳工业品贸易中心遵义路商场、贵阳轻工服务公司一门市部等三个国营、集体商店乱开发票的典型事例,提出了乱开发票成为干扰物价改革的一大社会公害的报道主题,使这一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说服力。这条新闻当晚在贵州电视台播出,9月1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显要位置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就给贵州省委办公厅打电话,肯定了这条新闻,并指示立即将贵州省税收检查情况整理上报给中办。9月20日,国家税务局要求贵州省税务局及时将电视新闻中报道的有关情况和全省开展发票检查情况上报国家税务局。9月24日,贵州省税务局派人专程到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和贵州电视台表示感谢。

山西电视台6月初播出新闻“霍县瓷砖厂引进一条生产线盖了五百个图章”,抨击了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山西台5月16日播出的“副庭长索贿,院领导包庇”的新闻,揭露了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共产党员刘培应办案索贿,事情败露后,又受到该院院长黄杰包庇的问题。此稿被山西电视台、山西日报、法制日报采用,并引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和山西省委、人大的重视。

青海电视台的连续报道“李继东虐待妻子”,从1987年12月26日播出,到1988年2月11日结束,从该事件发生到李继东被捕、受到法律制裁,连续报道13次。插播了青海省、西宁市妇女界和李继东所在单位的领导、职工以及部分司法工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批判了某些人头脑里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说明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

(五)积极投入抗洪抢险报道,鼓舞灾区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1988年是我国自然灾害较多的一年。在抗灾斗争中,广播电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7月30日凌晨,浙江省宁海、奉化两县暴雨成灾,洪水泛滥,交通、电讯中断,人畜伤亡严重。宁波台记者立即赶到灾区采访,当天就发出第一条灾情消息,中央台31日早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后,当即引起国内外关注;联合国的有关组织和日本国驻华使馆先后在31日和8月1日致电宁波市人民政府了解灾情并表示愿意援助的意向。正在舟山检查工作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听到广播后,立即到受灾最重的宁海县慰问群众。7号台风袭杭州,电力中断,浙江台启用备用电机,播音员打着手电播出抗灾综合消息。8日这一天,新闻播出次数由原来的9次,增加到19次。8日深夜10点至11点间,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先后打电话给沈祖伦省长,对全省人民表示慰问。一个小时后,浙江台就播出了这一消息,给灾区人民以极大鼓舞。湖南台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抗洪抢险救灾报道中,播出录音新闻、消息、通讯、评论等稿件共计280篇,平均每天8篇以上。9月17日的全省联播节目里发稿20篇,其中抗洪抢险的消息就占17篇。大通湖农场一分场9月11日陆上交通中断,记者王晃顶风冒雨,日夜兼程,13日上午赶到现场采访,当晚发回干群抢险堵决口的消息。他患了急性肺炎和病毒性心肌炎,仍坚持采访、写稿、传稿,最后昏倒在地。由于广播电视在抗洪抢险中发挥了作用,因此受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好评。湖南电视台、湖南台记者部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抗洪抢险先进集体”称号和锦旗。

在广播电视宣传改革方面,各级广播电视厅、局、电台、电视台本着“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继续探索前进,重点是提高宣传质量,合理设置节目,提高社会效益,而不片面追求节目套数。同时,许多电台、电视台都开始注意研究如何按广播电视自身

的规律来办好广播电视。

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在1988年得到稳步发展。1988年各级地方广播电台累计达459座,比1987年增加75座,人口覆盖率达到70.6%,比上一年扩大了0.1%;各级地方电视台累计421座,比1987年增加56座,人口覆盖率达75.4%,比上一年扩大了2.4%。

1988年广播电视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某些节目或稿件传播了一些片面的观点,个别新闻报道不准确;宣传形式不够生动活泼,有些节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违反宣传纪律的情况时有发生,给宣传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事业建设还难以满足群众听好广播、看好电视的要求,尤其老、少、边、穷地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问题更为突出;经费短缺,甚至影响到正常播出;管理工作没有跟上情况的变化,等等。

(陈玉清)

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展概况

(一)为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听众的需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7年全面改革调整广播节目的基础上,1988年对节目作了进一步的改革调整,7月4日起实施。

1. 以丰富内容、提高质量为重点,改革新闻节目。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增加信息容量,突出报道重点,提高新闻时效和开放程度,合理安排节目,争取把每天的国内外要闻准确及时地传播出去。第一套节目以新闻为主,基本上做到整点有新闻,次次有更新。第一、二套节目新闻次数由每天23次增加到28次,加上对台湾广播和对少数民族广播,全天新闻次数达到85次。一些重大报道,突发性事件新闻,按事件发展进程随时报道。每天播发的新闻条数比1987年增加了近50%。同时,调整了新闻宣传工

2. 为满足听众日益增长的欣赏高质量文艺节目的要求,大力发展立体声广播,大幅度增加了立体声节目的播出时间。从每天播出7.5小时增加到18小时零5分,增加了节目内容和品种。这样,中央台第三套节目就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以播送音乐为主的立体声节目。这套节目除覆盖北京地区外,还用微波送到全国各大城市。已有20多家地方电台转播或部分转播这套节目。

3. 按照精办节目、创办更多名牌的要求,继续对部分专题节目进行了调整。在原《青年之友》、《星星火炬》节目的基础上,创办了《青春年华·少年时代》这一以思想漫谈为主的综合性节目,主要就青少年关心的问题,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普遍问题进行教育引导。《科学知识》节目更名为《科技与社会》,增加了科技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以使科技宣传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颇受听众欢迎的《法制园地》节目,播出时间由每次10分钟增为15分钟,《午间半小时》增加了重播时间。新开办了《评书连播》和《今日节目介绍》节目。

4. 对台湾广播适应海峡两岸发展关系的新形势,对节目布局和内容作了调整,加强了新闻、大陆情况的介绍和服务性节目,开办了《时事漫谈》和《空中服务台》节目。

这些改革调整都受到听众的欢迎,1988年收到听众来信390000件,比1987年增长44%。

(二)在“两会”等重要活动报道中有新的突破。

1988年春天的七届人大、政协一次会议的报道,是历届人大、政协会议的宣传中体现民主气氛最好、最活跃、透明度最强的一次。中央台各类节目共播出各类稿件750多篇,现场广播大会开幕、闭幕、记者招待会等7次,播出记者招待会的录音新闻、录音剪辑16次。第一次现场广播了人大、政协的闭幕大会,包括代表、委员们对决议草案的不同意见都如实照播出去,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大会期间举行的6次记者招待会,中央台现场广播了4次,这在中央台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突出会议主题,

反映民主气氛,既增加透明度,又掌握好政策和分寸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采用多种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及时的充分的报道。同时加强了小组活动的报道,充分反映了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民主气氛。新闻时效也有明显增强。对未做现场广播的全体会议、记者招待会、主席团会议等重要活动,几乎都与大会进程同步作了连续报道,一共有30多次。人大、政协会议的4次选举和表决领导人,在准确的前提下,其时效都达到了除现场广播之外的最快速度。4月8日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三项选举,首播比电视台快13秒58;4月9日表决国务院总理等人选,首播比电视台快11分钟;4月10日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首播比电视台快15秒;4月12日表决国务院副总理等人选,首播比电视台快20秒。

在1988年9月17日—10月2日的第24届奥运会的报道中,除开办专题节目、利用整点新闻的优势,及时、大量地播发比赛消息外,根据新的情况,增加分析性报道和述评的数量,加强了报道深度。奥运会期间,对全国广播的两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共播发自采自编的述评等言论性稿件45篇,比以往任何一次同类报道都多。这些稿件,较为全面地、客观地分析了我参赛选手面临的形势、失利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我国体育的发展和与世界的差距,实事求是,恰当地掌握“温度”和分寸,对帮助听众正确理解我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胜败得失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好评。

另外,重要节目的宣传较以往也有新的特色,例如春节晚会《你好!龙年》,五个半小时的节目,听众认为立体感强,人情味浓,富有时代气息。

(三)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改革,在深度上有所前进。尤其是关于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宣传报道中,把握比较稳。既理直气壮地宣传十年改革的大好形势,又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选择群众关心的角度,实事求是,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使群众感到

电台讲的实在、可信,抓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新闻报摘》《全国联播》《十点新闻》《午间半小时》等节目都接触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关于国产汽车的报道,关于七、八、九月份水情、抗灾的报道,关于学生辍学问题的报道,关于化肥、农药、农膜问题的报道,关于物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安乐死”的讨论等,都受到听众的欢迎和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方面的重视。邓颖超同志专门写信给电台参加了“安乐死”问题的讨论。

(四)围绕广播宣传举办了一系列群众性活动,加强了电台与听众的联系。如《午间半小时》举办的《我看改革》征文,《对农村广播》举办的《农村改革十年谈》征文,《法制园地》节目举办的《法律知识竞赛》和《大家回答》(举出一个案例,提出几个判定的问题,请听众回答),《国际新闻与时事》节目举办的国际知识竞赛,对台湾广播节目举办的《海峡情》征文,《民族大家庭》节目举办的《每月一问》(每月提出一个民族知识方面的问题),《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举办的节目开播七周年英语知识竞赛,文艺节目中举办的新时期征歌活动等,都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扩大了听众参与的规模和深度。

(栗国安)

1988年中央电视台 发展概况

1988年是中央电视台建台30周年,也是中国电视事业创办30周年。我国的电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逐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其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经过30年的发展,日趋成熟。1988年3月中央电视台正式迁入新建的彩电中心并开始播出,工作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又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8年5月19日,经上级批准,中央电视台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台长黄惠群,副台

长兼总编辑洪民生、副台长杨伟光、陈汉元、于广华、总工程师孙同耕。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阮若琳。这一年中,尽管宣传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搬迁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但是在全台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在新台建立了正常工作秩序,保证了宣传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这一年中,电视宣传积极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做到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电视宣传的一些成功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1988年电视宣传基本情况:

中央电视台办有三套节目,一套节目通过微波和卫星传往全国;二套节目通过卫星向全国发送,其中包括每天两小时左右的英语节目;三套节目只对北京地区播出。1988年中央电视台三套节目共计播出10530小时,平均每天播出量为28小时56分;其中自办首播节目平均每天为4小时54分。

新闻是电视宣传的骨干,目前我台开办有《新闻联播》《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英语新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闻联播》节目,据收视率调查,这个节目平均收视率都在40%以上,许多观众反映,《新闻联播》是他们每天必看的节目,是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主要渠道。由于《新闻联播》每晚19:00播出,许多当日的重要新闻均可收录在内,新闻时效要优于报纸。许多党政部门都把《新闻联播》看作一条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这就更加强了《新闻联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中央电视台公开向社会发出公告,电视新闻节目一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决不搞有偿新闻,坚持做到这一点,对于树立新闻单位的形象,保证新闻质量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1988年共播出新闻24898条(不包括《经济新闻》),其中我台自采自编的新闻9006条,地方台新闻8630条,国际新闻7148条;全年国内新闻共播出17750条,其中《新闻

联播》7740条,《午间新闻》5253条,《晚间新闻》5077条;全年向亚广联新闻交换和普遍向世界传送新闻390条。全年共播出新闻专题40集。

电视新闻报道的总基调是健康的,较好地体现了党中央的精神,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从大局出发,进行舆论引导,消除人们的疑虑,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宣传、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以及清理基建项目、粮食收购、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一系列重大宣传报道都把握的比较好,有事实、有典型,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注重电视新闻时效已成为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凡是当天发生的重大新闻基本上能做到当天播出,各地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绝大部分也能通过微波线路及时传回播出。大秦铁路一期工程完工的消息,通车典礼地点距北京160多里,下午4点半结束,记者想方设法,赶回台内保证当晚播出了头条新闻。

举世瞩目的第24届奥运会期间,电视新闻更是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前后方密切配合,保证了新闻传送。此次奥运会报道总时数为181小时,其中现场直播72场,录像35场,专题16辑,是历届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报道量最大的一次,开创了电视体育报道的新纪录。

军事宣传围绕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条例,播出了大量的新闻和专题,受到军队领导同志的表扬。《人民子弟兵》栏目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经济宣传一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二套节目共播出《综合经济信息》362集,在普及科技成果,传播经济信息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评论性栏目《观察与思考》《周末热门话题》,就观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述评,有相当的深度,受到观众欢迎。

1988年各类专栏性节目注意了节目质量,办出栏目特色。一些大型电视连续节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电视片《祖国不会忘记》为我

们展现了奋战在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人们的崇高的胸怀和精神境界,歌颂了无私的奉献精神。为中国电视创办30周年制作的电视节目《世界在你面前》,回顾了中国电视30年的经历和发展以及与国际电视界对比,可以称为一部形象的中国电视发展史。大型电视片《蜀道》,歌颂了祖国的壮美河山,摄制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改革——时代的大潮》《中国龙》《不能消失的颜色》以及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而摄制的《道风阳》等节目也都受到观众的好评。另外我台还与社会各有关单位合作开办了一批电视教育讲座。这些讲座节目以科普和技能教育为主,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是一条良好的教育途径。

对少年儿童进行德、智、体、美、劳的教育,历来是电视少儿节目的宗旨。为配合学校和家长教育好下一代,电视少儿节目象深入千家万户的家庭教师,同时又是少年儿童的朋友。一年中电视少儿节目注意体现少年儿童的特点,让他们走上屏幕自己做节目的小主人。办出了一批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特征的、生动活泼、寓教于乐的节目。六一儿童节举办的少儿晚会“我们的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这一年中,电视文艺节目质量不断提高,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现有的文艺栏目经过重新调整,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以综合文艺为主的《文艺天地》和以舞台歌舞为主的《旋转舞台》以崭新的面貌赢得观众的好评。这两个栏目播出的好节目有《胡里奥音乐会》《多明戈访华音乐会》《国际交谊舞、拉丁舞比赛》《拯救威尼斯长城义演》反映人际关系的电视文艺作品《人与人》,为建台30年举办的《愿你笑口常开》晚会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等。

1988年的龙年春节晚会、十一晚会和元旦晚会,特点突出,个性鲜明,春节晚会突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国庆晚会融贯古今中外,编辑手法新颖;元旦晚会以竞选主持人的方式别开生面,都获得了观众的肯定和好评。

1988年成功地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文艺比赛。其中有第三届全国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与辽宁台合办的全国喜剧小品电视邀请赛、第二届全国专业相声比赛、与地方台合作举办了全国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选赛。这些比赛促进了文艺创作繁荣,同时丰富了电视屏幕。

全年三套共播出电视剧360部1155集。这些电视剧基调健康,风格手法多样,题材广泛。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表现改革,反映现实的题材占了大多数。如《大角逐序曲》、《大地冲击波》、《大西北人》等。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有新的作品问世,《末代皇帝》等以新的艺术观点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加工,作品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人物传记片《严凤英》、《陈云出山》、《千里跃进大别山》等在艺术上各有创新。儿童剧《好爸爸、坏爸爸》内容新颖,注意表现孩子们的心灵世界,受到小观众们的欢迎。名著改编的作品有《西游记》《家、春、秋》《黄河东流去》《死水微澜》等。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8年共摄制完成81部集电视剧,全年提供播出的剧目有106部集,美术动画片12本。

全年共译制播出外国影视剧308部集,许多译制片受到观众的喜爱。

对外宣传一年来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向国外输送了大批介绍中国的各类电视节目,除参加亚广联新闻交换外,每天向日本NHK传送国内要闻。我国还定期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东欧广联、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录像集团、美国天波公司等发送英语新闻。配合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驻京记者专门制作了一小时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目,10月1日晚在苏联电视台播出,受到苏联观众的好评。参加了法国电视一台主办的世界青年聚会实况九国大联播,法国方面认为中国部分是节目中最好的。参加美国纽约公共电视台WNET为奥运会开幕组织的“彩虹环绕世界”14个国家文艺节目荟萃,中国部分被认为是艺术、技术兼优者。接待了苏联、英国、匈牙利、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印度

等 11 个外国摄影队。

对海外华人电视台改变了供片关系,由无偿赠送改为低价订购,并且发展了一批新定户。对台湾的电视宣传有了较大的突破,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电视界间接或直接与我建立了联系,在与台湾电视界合拍电视片,向台湾传输我电视节目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台英语节目播出两年来,得到了在华外国人的充分肯定和欢迎,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据了解,东南亚地区和台湾都可以利用家庭卫星接收设备收看到这套节目。1988 年,我们对英语节目作了改进,初步实现了栏目化,增加了新的节目内容。

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一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纪念建台 30 周年,编辑出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 30 年》论文集,全书 61 万字。编辑出版了 6 期《电视业务》。每周一期的评论电视节目的小刊物《观感选辑》言简意赅,对于促进电视节目提高质量颇有益处。每月一期的《业务交流》汇集了第一线电视工作者的经验之谈,深受地方台同志的欢迎。此外还配合新闻、专题类电视节目召开了多次业务研讨会,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电视学会组织进一步健全,并为地方台举办了编辑记者研修班和通讯员培训班。

中国电视报克服种种困难,报刊质量有所提高,发行量增加,为配合电视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电视广告现在已成为电视节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广告为电视宣传提供了经济来源,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台首创的社会公益广告节目《广而告之》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社会公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 年,观众联系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年共收到观众来信 200546 封。为解答观众的各种问题,配备了专人负责阅信复信工作。观众收视率调查工作基本走入正轨,建立了全国和北京地区两套调查网,采用科学的方法设计实施,为搞好电视宣传提供了大量的调查资料。

1988 年电视宣传管理工作也有所进展,节目选题计划工作进一步加强,重大宣传活动都制定了详细的报道计划。编委会对全台的栏目设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重新确认了栏目设置。为了加强电视新闻宣传的集中领导,成立了新闻中心。

1988 年我台的专题节目《不能消失的颜色》和《中国珍稀动物》在意大利第二届全国国家公园纪录片国际电影节获卡瑞波罗奖;歌舞专题片《金舞银饰》在金色布拉格电视节上获得“传统与民族音乐奖”。

(穆晓方)

1988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展概况

1988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坚持以宣传工作为中心,锐意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团结合作,勇于进取,在改进节目面貌、提高新闻时效和节目质量、建立适应广播特点的宣传工作秩序、加强听众联络、发展与外台合作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对外广播宣传工作又登上了一级新台阶。

(一)

1988 年,国内问题的对外宣传充分报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改革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40 周年、西藏问题、云南地震、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等重大事件。国内新闻部全年共发国内专稿 780 篇,新闻 4149 条(其中自采 1253 条,占发稿总量的 30%,超过上年近 25%的比例)。这些稿件在体现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映我国当前经济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民生活方面又有新的开拓。专稿和新闻的采写上注意报道重大题材和时效性强的新闻事件与人物,更加贴近了生活,稿件形式注意了广播特点,音响效果得到

较充分的运用。为加强经济报道,开设了《中国经济建设与改革》、《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国名优新产品介绍》三个专题节目。各省、区、市记者站对国际台供稿 2339 篇,采用 1387 篇,其中新闻 9615 条,专稿 426 篇,采用率为 59.31%。

国际问题报道方面,国际新闻部共发国际新闻 12801 条,其中采用我台驻外记者站稿共 5040 条。国际专稿、评论 897 篇,其中自编 593 篇,比上一年增加 213 篇。重大事件如两伊停火、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美苏领导人互换中导条约批准书并开始按条约销毁中导、巴勒斯坦国成立、巴总统齐亚·哈克遇难、陷于 13 年战乱的安哥拉恢复和平、纳米比亚赢得独立、越南同意从柬撤军等,还有杨尚昆主席访朝、李鹏总理出访亚太三国、钱其琛外长访苏,以及印度总理访华、欧洲、拉美、非洲、亚洲各国领导人来访(共 80 多起)等都做到了准确、及时、充分的报道。国际新闻的时效观念和竞争观念明显加强,如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字不到一小时,国际部就发了有关评论。这一年,国际台又新建了驻联合国、苏联、津巴布韦、澳大利亚、比利时、阿根廷 6 个记者站,至此,我驻外记者站已达 16 个。除新建站津巴布韦、阿根廷、比利时外的 13 个记者站全年共发回新闻 7974 条,其中发通稿 5040 条,供对象语言用的中外文稿和口播稿 2706 条;专稿 623 篇,其中发通稿 368 篇,占国际部全年播发国际专稿总数 897 篇的 41%。中央台《报摘》、《联播》、国际新闻和新闻节目 3 至 12 月共采用我驻外记者站发回的新闻 2085 条;中央电视台《联播》和新闻节目共采用 245 条,这表明了我驻外记者站在加强广播、电视国际问题宣传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体育报道方面,我台赴汉城奥运会七位记者组成的报道组采发了消息 126 条,专稿和口播稿 96 篇,对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受到外国听众的好评。这一年,体育宣传共发消息 1064 条,专稿 228 篇,“集锦”50 篇,对全国农民运动会、城市运动会、吉隆坡“汤姆斯杯”“尤伯杯”

羽毛球锦标赛等十多项国内外重大赛事也作了充分报道。

文艺宣传全年共发稿 380 篇(次),其中有对首都地区英语广播的《中国音乐》《音乐集锦》《周末之夜》《外国音乐》《通俗歌曲和轻音乐》等专题发稿近 200 篇;文艺通稿 160 篇;向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编发寄送音乐节目稿 20 篇。还采访报道了国内举办的 13 项重大文艺活动,录制实况 30 多场。

(二)

1988 年,国际台加强了对外宣传的领导工作。1 月 18 日开始正式建立了全台编委会制度,主管宣传的副台长、编委会成员、中心发稿部门主任等每天早晨在总编室召开编委会,汇总当天来自各方的新闻信息、采访线索以及宣传精神,并通报全台,每天两次制定出《要闻目录》(全年共发 678 期)。这一年还推出《国际台关于全台节目构成规范化及建立节目、审听制度的暂行规定》,在从根本上改变全台广播节目面貌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10 月 1 日起,国际台各语言节目启用了新的节目《开始曲》和《结束曲》。

这一年的 5 月 1 日和 9 月 1 日,国际台又先后开办了对国内的法语、德语和日语广播。目前,我台已有英、西、法、德、日五种外语对国内广播,每天播音 8 小时 30 分钟。新增办的这三种外语广播受到对象国驻华机构及国内各界人士的欢迎。非洲法语国家使团、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驻华使节都对我台表示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英语部从 5 月 16 日起对国内英语广播新闻实行直播,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

这一年,全台各语言节目在加强针对性、增加自采自编稿件上有很大进步。全年,全台自编自采稿件达到 24180 篇(条),其中语言部组自采自编稿 11650 篇(条),几乎占中心发稿部门发稿总数的一半。各语言节目的内容日趋丰富多彩,专题节目新增设 50 多个。每逢对象国家的国庆、独立

日、同中国建交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或其他高级代表团互访,还都分别举办特别节目,特别能引起对象国听众的关注。

许多语言广播涌现了一批深受听众欢迎的名牌节目。如我台 11 个语言:英语、日语、泰语、朝鲜语、老挝语、波斯语、波兰语、汉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的《汉语讲座》节目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僧加罗语的汉语教材已准备就绪,其他已编纂完毕准备出版。《听众信箱》节目已经成为我台的传统名牌节目,成为我台联系听众的重要渠道。英语对内广播 5 月 9 日开办的“时事”节目亦已成为我台的名牌节目之一,在七届人大、政协一次会议期间,还直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实况(共三场),受到好评。

(三)

1988 年,我台同外国电台交流和合作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互转节目、传送寄送节目时数成倍增加。继 1987 年瑞士国际广播电台、马里广播电台转播我台共 19 种语言 19 小时节目后,1988 年又实现了西班牙语国家广播电台转播我台 2 小时英语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转播我台 9 种语言:西班牙语、汉语普通话、英语、罗马尼亚语、捷克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匈牙利语共 6 小时节目,大大改善了收听效果。

全年我台有 11 个部、组向世界 34 个国家的 68 家电台传送、寄送节目共 1178 小时 8 分 07 秒的节目。接受我台传送寄送节目的国家有:朝鲜、美国、加拿大、法国、埃塞俄比亚、葡萄牙、埃及、斯里兰卡、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阿曼、约旦、科威特、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南也门、苏丹、北也门、阿联酋、罗马尼亚、苏联、墨西哥、西班牙、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波兰、匈牙利、澳大利亚、阿根廷、毛里求斯。其中 41 家电台定期播出我台提供的寄送节目。

1988 年春节期间,英语部同英国广播公司曼彻斯特电台“东方地平

线”节目举办了春节联播。华侨部广州话与英、荷、美、加四国华语电台通过卫星进行了五台龙年贺岁大联播。英语部的文化节目《清明上河图》还获得 1988 年度澳大利亚大洋洲广播艺术科学院的《培特奖》,最佳特别音乐节目奖。

这一年,我台先后接待了来自联合国、日本、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英国、苏联、澳大利亚、荷兰、波兰、法国、加拿大、瑞士、西德、泰国、南斯拉夫等 14 个国家的代表团共 152 人来访;先后派出 128 人出国采访、友好访问、业务进修或考察;聘请了外国专家 39 人。

依靠社会力量办广播方面也迈出了新的一步。我台同北京旅游局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中国》龙年征文活动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收到来自世界 87 个国家和地区的应征文稿 12907 篇,文章作者分布地域之广是历次征文所少有。英语部、文艺部举办的 1988 年新闻特别节目《新年好》文艺表演比赛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华侨部同香港一国货公司联合举办的《月是故乡明》侨乡知识竞赛收到很好的效果。华侨部组织的归侨、侨眷及港澳台同胞业余歌手竞赛、《华声音乐会》和全球华人歌星和台湾时装巡回演出活动先后在全国 20 多个城市演出 80 多场。文艺部主办了首届全国省市电台立体声音乐节目交流会获得了成功。

(四)

听众工作得到了加强。全年共收到世界 139 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 169,046 封,比上一年(155,878 封)增加 13,168 封,保持了连续五年增长的好势头。

这一年,国际广播调研工作方面,广播电视参考资料正式改版《世界广播电视参考》,出刊 12 期,约 50 万字。国际广播业务刊物《国际广播》出版 6 期,约 60 万字。其他刊物《国外听众反映》、《驻外记者通讯》、《对外广播日报》、《对外广播动态》等的质量上不断提高。为加强调研工作,及时掌握国外輿情动态,研究室正式成立了收听外台小组。

国际广播的理论研究也得到加强。中国国际广播学会举办了首届国际广播理论研讨会。我台和外文出版社还联合举办了“对拉丁美洲报道研讨会”。

国际广播出版工作全年共出版图书 87 种,总印数达 368 万多册,录制录音带 31 种。

技术工作的改进为对外广播的准确、及时提供了技术保障,全年对 15 个语言部组使用的机房设备进行了更新。我台计算机应用一期工程的软件开发已正式验收,部分应用软件已投入使用;编辑、办公现代化工作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台匈牙利语组译审柴鹏飞获“匈牙利文化奖章”。表彰他长期从事匈牙利文化工作并做出杰出贡献。

(曾 平)

1988 年我国新闻教育事业 发展概况

1988 年是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开端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 70 周年。1918 年 10 月 14 日,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此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从无到有,从照搬国外新闻学体系到摸索结合我国的实际,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 to 博士生、硕士生、本科、大专、成人教育(在职或脱产培训)的多层次格局,从只培养报纸采编人员扩展到培养广播电视、新闻摄影、管理和研究人员……特别是 1983 年由中宣部和原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以来,我国新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展。至 1988 年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 48 所,大陆除青海、海南两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培养新闻人才的基地,大体上满足了各地区对新闻人才的需求。新闻类专业点由 1983 年的 16 个增加到 74 个,增长了 3.6 倍,其中本科专业点 41 个,专科专业点 25 个,研究生专业点

8 个。从 1984 年至 1988 年的四年内共输送了毕业生 5220 人,相当于建国 33 年(1949—1982 年)来新闻毕业生的总和。其中本科生 2322 人,专科生 2760 人,研究生 138 人,不少人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新闻队伍的骨干力量,为缓解新闻战线人才奇缺、青黄不接的局面做出了贡献。同时函授、夜大、电大、自学考试等多种新闻教育形式也有了很大发展。据统计,1984 至 1988 年经过培训取得大专以上文凭的人数达 2 万多名。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举办的报纸经营管理干部专修科今年有 38 名学员毕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批经过正规培训,掌握现代化科学管理知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新闻经营管理干部。

在新闻教材建设和科研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广大教师的辛勤努力,在总结我国新闻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新闻学,传播学以及其他与新闻学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公开出版的新闻学教材已由 1983 年的 4 种增加到近 100 种,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教材编写规划的新闻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共 40 种。此外,各高校新闻专业还积极承担了一批国家和教委“七五”科研项目中的新闻学研究课题和调查任务,密切联系当前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开展的 1988 年《首都知名人士龙年瞻望调查》就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普遍关注,有近 20 家报纸登载了该调查成果。各新闻院校还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国外一些相关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据统计,1983 年以来,我派往国外进修访问和学习的教师有 74 人,到我国高等院校访问与讲学的外国新闻学专家、学生、教授达百人之多。

新闻教育改革也迈出了新步伐。为适应各种现代化传播媒介的需要,各新闻院系调整了培养目标,拓宽了专业口径,开设了一批新课程,如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管理学、广播电视新闻制作、电视新闻摄影与编辑、以及经济、法律、自然科学基础等课程。广大教

师还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认真组织学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重视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各新闻院校根据自己的条件,探索不同的办学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培养的新闻专业学生要“政治嗅觉灵一点,知识面宽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适应面广一点,后劲足一点”。在办学中“强调基础、重视实践”。注意发挥综合大学多学科互相渗透,文史功底好的优势。华中理工大学提出“打好专业基础,调整知识结构,培养动手能力,造就全能记者”。发挥本校文、理、工、管多学科优势,使传统的新闻文科型人才向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新闻复合型人才发展,造就一批懂科技、管理、经济,掌握现代化技能,会摄影、能开车的“一专多能”的新闻人才。北京广播学院提出“拓宽知识面、加强口头表述训练、增加相关学科、文理渗透、力求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教学方针,发挥本校广播、电视多学科的优势,使学生由“编、采”向“编、采、播、评、控”多功能发展,培养一批既能采编,又能播音和做节目主持人的新闻人才。中国新闻学院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根据社会的需要招收经济、法律、科技、体育、军事、民族等不同类型的新闻报道班,提出“在系统传授新闻理论基础上,强调新闻采编实践”的教学方针,发挥新华社名记者、名编辑多,师资力量强、外语好,设备先进的优势,采取边学习、边实践、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方法,以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新闻实际工作者为主,而不是专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江西大学等都努力发挥各自的所长,办出自己的特色。

加强对在职新闻干部的培训,提高新闻队伍的素质仍是我国新闻教育面临的重大任务。上海在 1985 年成立的“上海新闻广播电视职业学校”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教学设施比较齐全的新闻广播电视培训基地,至 1988 年 8 月已举办各类在职新闻干部培训达 18 个班次,共约一千余人。中国记协职工新闻学院与工人日报今年继续联合举办 4 期企业报主编新闻研修班,约 500 余人参加。中国

新闻学会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联合举办了以地、市报纸总编为主要对象的高级新闻研讨班,今年已办了3期,近百人参加。特别是中宣部于11月15日至12月28日在京举办了有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主要新闻单位和部分省、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共44人参加的新闻研修班。胡启立、芮杏文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研修班学员进行了座谈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宣部领导和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作了有关新闻宣传与改革、新闻与法律等方面的报告。研修班采取开放办学、民主办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围绕贯彻十三大及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一主题,总结经验,研讨新闻工作的一些重大政治原则。讨论如何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推进新闻改革等问题,最后形成了“中宣部新闻研修班研讨纪要”,并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及党委机关报和中央新闻单位参阅。

1988年召开的有关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要会议有两个:一是6月16日至20日由新闻教育学会、郑州大学、河南省新闻学会及郑州晚报社联合举办的“全国新闻改革与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一是11月16日至19日国家教委在南宁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近几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发展的情况和巨大的成绩,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加强和深化新闻教育改革的意见,它将推动我国新闻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

(洪一龙)

1988年我国新闻学研究发展概况

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这一大的环境背景推动了1988年我国新闻学的研究迈出了较大的一步。这是我国新闻学研究比较活跃的一年,涉及的研究课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以下13个方面:

(一)新闻体制研究。大多数论文认为,我国以机关报为主体的新闻体

制,缺乏自身调节的功能,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而体制问题的要点是权力与新闻业的关系。有的论文认为,我国的新闻体制必须从权力与新闻业的“刚性模式”向“柔性模式”过渡。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政治权力与新闻业的关系以柔性为主;远期目标是各自相对独立。有的论文从另一角度提出意见:新闻业要构成多层次结构,实行两种管理标准,一是宪法和法律标准(对非党的新闻业),一是党性标准(对党的新闻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二)新闻法研究。1988年初,三个新闻法草案出台;下半年,我国关于新闻诽谤的诉讼案激增。这些情况使这年的新闻法研究显得十分活跃。围绕新闻法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主要职能。有人认为,若主要职能是宣传,那么就没有必要制定新闻法。二是对新闻自由的认识。不少人认为,在法律上要对新闻自由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三是是否允许办民营报纸。这个问题分歧意见较大,有人建议在几个大城市先办几份大型综合性日报试试。四是舆论监督是否要经过批准,普遍的结论是不同意“批准”之说。其中围绕新闻诽谤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与法学有关的细节问题。

(三)舆论监督研究。这是1988年各个新闻学刊物的热门话题,人们殷切期待着舆论监督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亦对舆论监督实行之难发出种种叹息。关于舆论监督的文章很多,但持这两种基调的文章占多数。对舆论监督本身进行理论思考的论文相对来说较少,因此,尽管舆论监督作为一个口号已经普及了,但作为一种新闻学理论,1988年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端。有的论文指出:现代舆论监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一种普遍的而非人为赐予的平等的权利;普遍的舆论监督,又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然而,我国却缺乏现代舆论形式和发展的必要历史阶段。所以,舆论监督要真正名副其实,新闻体制的改革必须与

之同步进行。

(四)新闻学研究10年总结。“文革”后我国恢复新闻学研究到1988年,经历了10个春秋,因而总结这10年成为1988年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论观点有多大的分歧,所有新闻学研究者都承认,这10年是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有的论文认为,这10年的新闻学表现为从传统新闻意识走向现代新闻意识的过程。初期的显著特点是新闻学在传统格局中的拨乱反正;中期以后,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的推动下,传播学和各种科学方法论开始融入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由于政治与新闻学的合一现象没有完全消失,新闻学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研究水平较低,我国的新闻学尚不能说是一门处于科学状态的学科,而是处在走向科学的前科学状态。另外一些文章,则对“前科学状态”的估价提出异议。

(五)新闻受众研究。1988年是发表各种新闻受众调查的研究报告较集中的一年,这些研究报告的质量多数较前有了进步,它标志着我国在运用现代化科学手段进行新闻学研究方面已进入常规化时期。1988年发表的报告主要有:1988年关于经济改革宣传效果的调查报告、198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报告、1987年关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的调查报告、1987年中国公民政治心理和大众传播的调查报告,以及1988年当年关于对七届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新闻改革调查的结果报告。这些报告为新闻改革提供了行动依据,对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六)传播学研究。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论文,1988年的发表数量并不多,但质量有明显的提高,不再限于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介绍,而是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有的论文指出,传播学的兴起对原有新闻学来说是一次革命,但“Communication”这个词在中国译为“传播”,常人往往理解为单向传递,应当译为“沟通”。不同的译法代表了不同的理解和思维方

式。以往的“传播”译法在这些年中从理论到实践都造成种种局限,因此,需要从“沟通”角度重新认识传播学。

(七)新闻工作思维方式研究。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1988年推出一批质量较高的分析我国新闻工作思维方式的论文。这些文章论证了现行思维方式的种种表现、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例如黑白分明、单一因果、从结论到结论、典型指导、证实不证伪、逻辑演绎的怪圈等等。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这些论文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需要强化以下几种思维方式:发散思维、系统思维、横向思维、逆向思维和求异思维。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与新闻观念的更新必须同步。

(八)企业报改革研究。1988年初“全国企业报改革座谈会”以后,企业报改革遂成为一些新闻学刊物的讨论重点之一,发表了不少文章,各方意见不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企业报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二是怎样认识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报的任务。有的论文认为,企业报要摆脱产品经济的模式束缚,努力为职工获取新知识、新信息服务,帮助经销人员了解和预测行情,反馈用户意见等等;另一些论文认为,企业报要真正成为企业内部的新闻纸,不能把重心放到企业以外的新闻上。三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报的性质。有的论文认为,企业报本身是大工业生产的产物,不应该做为企业党委的机关报,而应是企业主办的报纸。

(九)关于典型报道观念的讨论。由于1988年出现了步鑫生被免职、年广九垮台、学雷锋25周年的困惑等等问题,这一年关于典型报道观念的讨论深化了,不少新闻学刊物发表了这方面的讨论文章。有的论文认为,典型报道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是要克服的,但典型报道在完善后还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些论文认为,典型报道及其观念是战争年代在一元化体制下的一种宣传鼓动的方式,与新闻的本质特征是冲突的,它在现在的新闻实践中正在弱化,被其他各种以新闻为本位的报道形式所替代,典型报道观念消亡的趋势是无可挽回

的。

(十)关于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后,新闻学界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在1988年深化,变成了新闻商品化讨论。有的论文认为,目前新闻界出现的广告新闻等等是商品化在新闻生产中的表现,因而一切精神生产都要抵制商品化。另一些论文认为,新闻界的广告新闻并不是商品化,而是旧的新闻体制对商品化的一种抵抗形式,因为出卖的并不是劳动产品,而是机关报独揽新闻传播的特权地位。真正的新闻生产商品化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中国的新闻生产不可逾越这一发展阶段。

(十一)深度报道研究。1988年的深度报道研究进入了总结性阶段,出现了一些宏观上论证深度报道产生背景、行为特征的论文。有的论文认为,中国深度报道的动因是记者自主意识的强化,而西方深度报道的动因是报纸媒介和电子媒介的竞争。所以,中国的每一篇深度报道至今仍然在政治审视中难以顺利地落地。但是每一篇深度报道的成功,都无形地冲破着政治对新闻的控制,并有助于解除观念上的自我束缚。

(十二)对阶级性、党性、喉舌等概念的探索。在总结新闻学10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涉及传统概念的论文。这些论文认为,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说法正在过时,党性不应成为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喉舌不应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能表现。这些文章大多不是重头文章,论证也比较简单,但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因而造成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文章本身。稍后,出现了另外观点的文章,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不能摒弃。

(十三)苏联新闻改革研究。1988年是介绍苏联新闻改革的文章较多的一年,但缺乏较高水平的分析文章。其中关于苏联实行公开性后社会心理的分析文章,值得一提。这些心理反映主要有:偶像崩溃带来的幻灭感和失落感;公开的报纸批评带来的不适感和不满情绪;对言论多元化的不适应症,等等。

(陈力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

十年来的科研工作

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艰苦创业,从资料积累和培养人才入手,致力于学科建设。本所虽有71人编制,但目前实有人数59名,其中科研人员40名,科研辅助人员7名,其余为行政人员。新闻所担负着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业史、新闻业务、外国新闻事业、应用传播媒介和新闻法制的研究任务。十年间,包括在新闻所任职过的领导和已调离去其他单位的同志在内,全所科研人员共发表专著27种,编、译国内外新闻学著作和论文集60余种,编辑出版《中国新闻年鉴》(年刊)、《新闻学刊》(双月刊)和《新闻研究资料》(季刊)三种大型刊物,写出了一大批有关新闻改革和我国新闻事业现状的论文、调查和研究报告,为深化新闻改革出谋献策。刚建所时,图书资料可以说是一无所所有,现已配备购置的中外文新闻类书籍2194种,存有解放前后的报刊20498合订本,剪编专题资料783册。同时,新闻所还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培养研究生378名,为一些新闻单位和党政部门输送了较高层次人才,使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人员青黄不接的矛盾有所缓解。实践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新闻所,对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对新闻学科的建设,是有战略意义的。

新闻所的创建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年轻的社会科学,新闻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这就形成了新闻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学科建设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的显著特点,同时,我所一些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定又和全国及地方的新闻学术讨论会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分不开的。我们本着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勇敢探索的精神,十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加强新闻学科的理论建设。

新闻所成立不久,1978年底,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给新闻理论研究带来了活跃的生机。当时,鉴于新闻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破坏性作用,新闻理论研究自然从反思过去的新闻工作开始,研究的重点是对被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再认识,其目的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既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研究课题,也是新闻学建设的起点。我们围绕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对建国以来的新闻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陆续产生了一些探讨性的成果,如《新闻学初探》《新闻学再探》《新闻理论探讨》《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简明新闻学》《现代新闻学》等书和一批论文。为了适应当时全国培养新闻人才的急需,又在对新闻理论基本观点探讨的基础上,采用集体攻关的办法,编撰了《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一书,以后又修订再版。今天看来,这些成果有些粗糙,论述不够缜密,体例上也有缺陷,但作为最初的探索之作,存在上述不足是自然的,其拨乱反正的积极作用不能低估。

对革命导师新闻思想的研究,也是新闻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3月12日,新闻所和其他单位共同发起举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前一个会收到论文和资料28篇,由我所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后一个会收到论文60余篇,由我所和湖南省新闻学会共同编辑了《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出版。在我国,研究革命导师的哲学、经济学和革命理论的专著出版了不少,但对他们的新闻思想作专门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系统研究革命导师新闻思想的开始,是一项创立我国新闻学的奠基工作,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对马克思、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范围和研究水平有待扩大和提高的状况。

对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我们主张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反对断章

取义的语录式研究。为此,我们重新编选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和《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两本书,旨在全面介绍革命导师的新闻思想,收入了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同类书回避了的篇目和论述。我们在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和编辑这方面的论著时,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部分青年中几度出现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当然,对这种情况要进行具体分析,但是,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宣传,那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文革”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歪曲,造成了严重后果,是这种错误思潮产生的原因之一。我们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研究和编撰工作没有受到干扰,反而增强了历史责任感。现在,在新闻所已经形成研究革命导师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浓厚空气。1986年,我所科研人员又撰写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我们还准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在世界一些国家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目前正在收集资料。

在新闻理论建设上,新闻所和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共同办的理论刊物《新闻学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该刊自1985年创刊以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闻学术界提供园地,先后讨论了列宁的办报思想、党报性质和典型报道、马列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过程、新闻与文化和新闻史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同时对新闻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如新闻立法、新闻自由、新闻体制、舆论监督等,也组织文章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并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份量的调查报告。

(二)中国新闻业史研究。

建所初期,新闻业史特别是报刊史是所科研计划的重点,投入的人力也比较多。这是和当时下功夫收集研究资料和一批老同志进所工作的具体情况有关,同时,当时的新闻改革还局限在新闻业务改进的范围内,国外的传播学刚刚接触,这就使报刊史的研究更为突出了。

史的研究主要是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个案研究,找出写新闻史的路子,为新时期新闻工作的

改革提供历史借鉴。1980年以来,我们组织了专门小组,从事延安《解放日报》和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史的资料征集、研究和编写工作。科研人员四处奔波,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从中央档案馆收集的有关两报的档案资料,为报史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华日报》史编写组还参加了《新华日报》史学会的筹建工作,出版了《新华日报研究通讯》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通讯》等两种不定期刊物。这两个报史的撰写人员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并把《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通讯和乔冠华撰写的国际述评,分别精编成《延安文萃》(上下册)、《抗战烽火录》和《乔冠华国际述评选》等资料书出版,使宝贵的历史资料拂去了岁月的风尘,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发挥教育和醒世作用。修史不易,再加上人员调动等原因,这两个报史的编写工作进展缓慢。目前,《新华日报》史已完成,1987年出版了该报史的上册。《解放日报》史尚未全部完工。

在旧中国著名报纸中,我们主要抓了《大公报》和《申报》的专题研究,写了一些研究论文,如《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张季鸾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社评》《论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鲁迅与申报自由谈》等,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都有一定的开拓,受到新闻史学界的好评。《申报》史的研究工作从1978年到1982年这四年主要由新闻所牵头进行,1983年以后,由上海市新闻学会承担。《大公报》史的研究目前仍由新闻所离休的老同志承担。此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由新闻所牵头组织了全国抗战新闻史讨论会。会议收到的论文由我所编辑成名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一书出版。这是大陆首次出版的一本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反映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专著。现在新闻史研究的重点已转到当代,正收集资料,编撰《中国当代新闻史》。

新闻业史研究离不开资料。十年来,新闻所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上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80年

就编辑出版了近1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全三卷),为研究党的新闻史提供了历史文献。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刊物《新闻研究资料》从1979年8月创刊至今,已出版了43辑,累计近800万字。在此基础上,还编辑出版了一套“新闻丛书”,目前已出到10种。《新闻研究资料》现已成为新闻学和文化史研究、教学工作者的的重要参考读物。从今年起,这份刊物的内容转到以收集和总结建国以来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重点,希望能得到全国新闻界的支持和协助。

(三)开展新闻受众研究。我国新闻学研究长期局限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个方面,1982年,我所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将新闻受众研究列入所的重点科研项目,运用科学的社会统计方法对受众(读者、观众和听众)进行调查研究,不但突破了原有的格局,而且有助于克服以往新闻学研究缺乏定量分析的弊端,并为国情调查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982年6月至8月,新闻所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合作,在北京地区开展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抽样调查,在13岁以上城乡居民中调查了2423人。这次调查将抽样调查和传统的典型调查相结合,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抽选样本和统计分析调查结果,对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先后国内外有20多家报刊和通讯社报道了这次调查结果,日本文教大学岸田功教授于1984年2月在日本《传播研究》第5期撰文,认为这次调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美国SHAPER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在1985年夏季号翻译刊出了北京调查报告的全文(译者是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副教授BRANTCY WOMACK)。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VERETT·M·ROGERS等于1985年4月在《美国传播研究》杂志发表论文,称赞这次调查是中国传播研究的“巨大进步”。1983年,新闻所又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浙江日报社等单位合作,进行了浙江省受众调查。

1987年与新疆新闻学会、新疆广播电视学会、新疆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合作,在乌鲁木齐地区进行了我国首次民族受众调查。1988年4月上旬又对七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了关于新闻改革的整体调查。

这些调查收集了大量来自受众的反馈信息,成为调整新闻传播政策、改善新闻传播设施、充实新闻传播内容、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依据。这些调查,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及其他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增强新闻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人民日报编委会于1986年8月,委托我所帮助在全国20个市、县对该报读者5061人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人民日报》是面向层次比较高的读者的报纸,在政策宣传上具有权威性,从而更加明确了这张报纸的改革方向。在对政协委员进行的关于新闻改革的调查中,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概括出政协委员们对新闻改革有四点期望:期望提高新闻的开放程度;期望多反映人民意见,加强舆论监督;期望一部保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尽快出台;期望新闻界加强自身建设。这次调查使我们了解决策层对新闻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明确了新闻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

新闻所运用调查统计的成果,已编成《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出版,纳入所重点科研计划的《新闻受众学》《舆论学》两本专著可望在今年和明年完稿。此外,1985年我们还主持了首次全国报纸基本情况调查,编撰了一部100万字的《当代中国报纸大全》。

(四)对国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

新闻所这项科研工作是与研究世界上有代表性国家的新闻事业与引进传播学理论同时交叉进行的。我所比较早地引进了传播学。当时,人们对传播学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人甚至认为是超阶级的“伪科学”。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采取了慎重态度。研究大体上分二个阶段进行。

首先,对传播学作出评介。1982

年11月,我所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传播学讨论会,主要解决如何认识传播学,如何开展传播学研究。当时明确了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是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这一研究阶段,我们集中人力,编写了《传播学(简介)》一书。

在评介的基础上,新闻还把传播学的某些理论、方法同我国传统新闻学研究相结合,取长补短,把公共关系学引进我国的企业管理领域。我们采用集体攻关的办法,在总结我国一些企业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基础上,参考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公共关系的著作《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成为应用价值很高的畅销书。

其次,确定研究方向。1986年8月,由新闻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共同举办了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根据我国新闻传播媒介和受众的实际状况,明确新闻传播学应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并决定编撰《新闻传播学》专著,纳入新闻所“七五”重点科研计划。

在对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已出版的专著和编译的书籍主要有《日本报业简史》《美国新闻史》《七国新闻传播事业》《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世界新闻史纲》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国外新闻业的研究刚开始时偏重于欧美和日本,近来也注重对苏联和东欧的了解,就新闻体制而言,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新闻改革对我们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会更大一些。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专题研究,于1985年4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世界新闻新秩序讨论会,提出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遵循五个原则:自力更生原则,集体自力更生原则,平等原则,合作原则和多样化原则。新闻所关于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系统研究论文,为我国驻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门机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与咨询。

为了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国外新

闻学的研究动态和新闻机构的动向,为研究提供线索和素材,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还译编了一份内部刊物《国外新闻研究动态》(打印稿),从1986年1月到现在共出了43期,免费向兄弟单位赠送。

(五)新闻业务研究

对新闻业务的研究,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几乎所有的新闻单位都办有研讨本单位具体业务的刊物。因此,新闻所关于新闻业务的研究要和新闻单位区别开来,我们立足于提高,把研究逐步引向深入和系统化,注重把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引进新闻写作领域。新闻所撰写的这方面的科研成果主要有《新闻实践漫谈》《新闻写作技法新探》《新闻标题的艺术》《中国摄影史话》等。近年来,我们加强了应用新闻理论的研究,把《现代应用新闻学》一书列入所“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目前正在抓紧时间编写。

新闻业务研究一点也不能脱离新闻实践,新闻所作为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首都新闻学会的依托单位,参与组织了历届全国好新闻的评选活动,对入选的作品进行评析,已编辑出版了九本《好新闻》,使这项评选工作形成制度,受到全国新闻界的普遍重视。此外,我们还参与组织了两个学会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主持编辑年会论文集,对推动全国的新闻学术研究起了一定作用。

为了系统而全面的反映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状况,为新闻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在全国新闻界和有关研究、教学以及出版单位的支持和协作下,我所主持编撰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年开始,到目前已出版了六本,每本100多万字。由于年鉴创刊晚,而我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丰富多采,所以每期年鉴又有计划地收入了一些历史资料。经过新闻业务研究人员的努力,年鉴的编辑工作速度加快,现在可以做到当年编辑的新闻年鉴于年底即可同读者见面。

(六)新闻改革的探讨和新闻立法研究

新闻所一直关注我国新闻改革

的进程,我们通过课题招标的方式,就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报业结构、报社内部的体制、新闻单位的企业化经营、会议报道的改革、新闻观念的更新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等现实问题,提交和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从宏观上对新闻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对新闻改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新闻所是最早呼吁新闻立法的单位之一,并最早开展了有关新闻法的研究。1980年我们开始收集国外新闻法资料,次年编辑出版了《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1987年又编辑出版了《续编》。为起草新闻法作准备,我们还围绕我国新闻立法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组织讨论文章,编辑了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在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草拟了我国新闻法草案。这些研究成果和收集的资料,为我国新闻法的正式起草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就十年来新闻所的科研工作来看,和国家的需要与新闻改革形势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真正有影响的科学的重头著作。如果把新闻学比作正在兴建的宏伟大厦,我们不过是做了点添砖加瓦的工作。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中国的新闻学体系一定能创立起来。世人莫谓天涯远,但肯挥鞭有到时!

(王凤超)

1988年我国新闻摄影事业发展概况

1988年我国新闻摄影事业取得了很有意义的进展。

(一)为了开阔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的眼界,吸收世界新闻摄影有益经验,同时也使外国新闻摄影界了解中国新闻摄影的历史与现状,这一年举行了三次重要活动。

1月5日应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中国日报》社的邀请,世界新闻摄影荷兰基金会将他们1956—1987

年间31届评选的优秀作品送来北京,三家联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大厅举办了《世界新闻摄影》展览。荷兰首相吕贝尔斯的夫人作为基金会代表团10位成员之一专程来北京参加这次影展开幕活动。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等参加了开幕式。万里接见了基金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与吕贝尔斯夫人一起为影展剪彩。有1500人参加了开幕式。在京展出10天,观众达5万之众。之后又易地广州、上海、武汉、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西安、郑州、太原等地巡展,直到年底。许多报刊作了报道与介绍。整个展出期间,观众人数之多,为中国影展史所仅见。基金会代表团表示,他们的影展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未见过在北京的热烈情景。

根据对等互换原则,《中国新闻摄影50年》展览仍由上述三家联合举办,于10月27日在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开幕,然后转到荷兰其他城市巡展。为参加影展开幕活动,以蒋齐生为团长的中国新闻摄影代表团一行13人,从10月24日至30日在荷访问一周。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及夫人25日在首相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首相夫人还在开幕式上发表热情讲话。这个影展,以1937—1987年间的270幅珍贵照片,真实地向西方观众展示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及改革开放几个历史阶段的面貌及中国新闻摄影的特色与风格。基金会主席斯瓦特认为,这个影展反映的事实,许多西方人不了解,有很高历史价值;不少照片有个性化的表现手法,证明了中国新闻摄影取得的进步。基金会对中国新闻摄影表示关注,愿意为中国新闻摄影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帮助。

11月21日,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当代摄影学会等单位联合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新闻摄影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30年回顾展》《美国新闻摄影界10年回顾展》《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纪念展》,同时邀请美国《生活》杂志、联系新闻图片社等单位的著名图片编辑、摄影